香港連繫研討會

2013 年 1 月 25 日

香港真的無藥可救?

王于漸教授

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

我今天演講的題目叫「香港真的無藥可救?」是一個很不成熟的題目，因爲我還未準備好。過了農曆年後希望可以準備充足些，日後在報章發表，在這段時間演講可能講得不好，希望大家多多包容。

首先，我的出發點是，在 1997 年 4 月時，有一個很巧合的場合，我在中環的會議結束後，與幾位與會者一同晚膳。當中有一位是商人，兩位是大學教師，包括我自己，另一位是政府高級公務員。晚飯時閒談，大家談到第一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快將上任，當時在座有人提起，董生上任之後，多年沒有做的事現在就要去做了，大家有些百廢待興的感覺。

那次之後，我發現，每五年我們便有相同的感覺。那天晚上有人建議，日後應該考慮在董生上任後，聘請一些超級局長。因爲政府的運作通常是條塊分明，現時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，是跨部門、跨範圍的，一定要有一些超級局長去推動幾位局長，才可解決我們的「百廢」，否則如何「興」呢？由一些超級的局長，去推動一些局長，幾個範疇，幾頭馬車，並駕齊驅，帶動香港，因爲在中英爭拗的過程中，很多事情好像沒有做到。當時大家還有一個感覺，覺得香港的前景是很好的，只是需要將這些百廢一興，令香港變成曼克頓是指日可待。

我記得 1997 年時確實是這個感覺，大家很有信心。15 年前只是隨口說了一句，但我當日所說的不幸，現在看來好像是正確的。我當時說，幾位超級局長推動這麼多局長，你以爲香港是新加坡？有人民行動黨？我們的政府有如此大的認受性？可以如此推動？我並不樂觀。15 年裏，我還是感覺這個問題的存在，你認爲我們真的可以找到五位爲香港市民接受的超級局長？香港並不是新加坡，我們的政治制度沒那麼強的認受性，我們的確是遇著很多問題，但我們凝聚不到一個共識，因爲我們的政治制度無法幫助我們凝聚這個共識。不幸這 15 年的歷程不斷地說明這個問題。

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？正如外國人所說 “This is a six million dollar question.” ，我想這是一個 six hundred billion dollar question，是一個大問題。本人當然不懂回答，但我可以說，我們得的是甚麼病，是有藥可救的。不過，有了藥之後，仍要有大夫才能夠使病人回春。那如何找到大夫呢？大夫就是要凝聚我們的政治共識，而這個共識並非香港公務員體系本身可以凝聚得到的。這點我容後再談。

我們得的是甚麼病呢？是否無藥可救呢？答案是有藥可救，但有沒有大夫我卻不知道，病人會否得救我不知道，但藥是有的，今天我只是賣藥，並不是神仙。

香港有幾個問題。第一，香港政府的架構大致分爲兩組，一半崇尚積極不干預自由經濟，這是財政司領導的一塊；另外一塊，是政務司領導的一塊，其實就是英式的社會福利制度。兩個制度在香港其實是並存的。一個是市場的，一個是政府的。這兩個制度一直到 90 年代並存而相安無事。由於我們的經濟發展比較好，人口比較年輕，所以依靠福利那一塊並不很大。加上從四方八面來了很多新移民，他們年輕力壯，當時更一個家庭生好多小孩，不像現時那樣一個家庭平均只生一個小孩，因此我們的勞動力很年輕、很有魄力。所以當時我們財政司領導的那一塊發展得很快，而福利那一塊比例較少，不會出現大問題。

到 90 年代，人口開始老化等等問題，福利那一塊必然開始龐大。由現時看，是不斷地擴大，政務司越來越威風，財政司的聲音則越來越小。時至今日，我們已看到積極不干預也變成要干預。財政司領導的那一塊小了，政務司領導的就是積極干預。外國人以爲香港是積極不干預，因爲他們來香港只與財政司打交道，而政務司則只與本地人打交道，所以外國人所認識的香港政府是積極不干預。他們只與財政司接觸，也不關心香港的福利制度，只關心在香港有沒有生意可做。其實，我們的政府裡頭已反映我們有兩頭馬車，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走。

這兩個問題遇著世界上兩個不同的變化。由 1980 年至 2005 年是全球化最快的時代，香港與全世界的結合是非常緊密，無論貿易、金融體系，包括聯繫匯率，均全面與世界結合。但無獨有偶，中國在 1979 年開始開放，一開放就了不得，竟然成功，以 30 多年這麼快的速度成功，歷史上從未見過。不過中國對我們的影響很大，這個影響，簡單看看，是令我們整個工業的生產架構大變。我們的製造業於 1986 年佔 34.7%，到 2010 年變成 3.4%，整個經濟體制變了。在中國改革開放及全球衝激下，經濟變了，而且變得很快，這是財政司領導的一塊。香港人的反應十足、隨機應變、看風駛船得快，成功變成服務業。我們的經濟改變了，這是第一個大變化。就業人數的變化更加明顯。

第二個大變化是我們的跨境婚姻立即增加。1986 年在香港註冊結婚的，連同在香港申領「寡佬證」（單身證明書）的人，其中差不多有 28%是與內地人結婚的。（申領「寡佬證」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返回內地結婚。若你到美國結婚，是不需要「寡佬證」的。）到 1996 年，註冊婚姻中有 43%是與內地人結婚。2006 年增加到 55%。2006 年是顛峰狀態，即每兩個結婚的人，起碼有一個是與內地人結婚，其餘是與本地人結婚或與外國人結婚。到 2009 年下降至 39%。香港的人口完全在重組中，向前看，將重組得更厲害。

我們的經濟變了，人口亦變了，唯一不變的是地，這又是一個大問題。土地沒有改變，當然與規劃有關。我們的工業已北移，但工業用地卻仍然繼續存在。爲何土地沒有改變呢？我們的制度是一個良好的制度，按部就班去做，但這種制度是無法面對這麼急劇的變化。這並不是當事人有何缺失，當事人是一個良好的看護人，但良好的看護人面對一個急劇轉變的世界，就像小時候讀的書：一名小童站在橋上等人來救援，但一直沒有人來，水卻一直上升，最終該名小童被水淹沒，仍在等人救援。若他要改變，又很危險，因爲改變的話，除非有一個很好的政治共識，否則很容易變成長官意志。再加上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四面八方受人批評的世界，任何運用所謂隨意的決策

discretionary decision，難聽一點，就變成了是長官意志，長官意志容易被人懷疑是利益輸送，或者別有用心。

讓我說些不中聽的話。現時人人批評梁展文，我和梁先生沒有甚麼關係，雖然也見過幾次。如果當日他沒有拍板，今天紅灣半島可能仍未建成。問題是甚麼呢？我們的制度是一個良好的制度，但面對急劇變化，既然是良好制度，又不可以輕易改變，不改變是良好的辦法，但又是嚴重的錯失。隨意改變的話，在這個矛盾重重的世界，會被人指責爲懷疑利益輸送，甚至是別有用心。因此，我們便僵持在這個局面之內。可如何解決呢？實屬見仁見智。由於長期不能獲解決，社會的聲音不斷要求擴大政務司長的工作，擴大各種各樣扶持的行爲，協助貧困，協助沒有良好工作的人，要求政府提供好的就業機會、好的經濟機會。你曾否聽過政府可以創造就業機會？如果有的話，北望神州，今日已老早超越美國，何須多等十年？在 1949 年開始，經過 30 年就可超越美國了。政府怎會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呢! 如果可以，計劃經濟老早就成功到不得了。就是放棄了計劃經濟後，中國經濟才起飛。放棄少部份力量就已經如此驚人，真是排山倒海，市場的力量實在是難以想像。我當然是歌頌市場，大家都知道我修讀經濟，並且在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是出了名信奉自由經濟。但這並不是信念，是有一定的科學價值。

香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？首先要問，中國的飛騰及全球國際化，使到歷史上這兩件事情剛好聚焦到香港，對香港的影響很大。因爲我們剛好在這兩股力量的中間，所以我們需要應變的速度，及應變的正確方法，這是非常難拿捏得準的，錯了就不行，基本上我們的空間很小。剛才說過 97 年 4 月時我們已感覺到錯失了機會，發展要加快，但 15 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仍覺得要再快些，但這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，因爲你要凝聚政治共識，那如何做呢？病是甚麼病我說了，藥是甚麼藥，我現在講講。

藥，當然是要重振財政司司長的權威，繼續捍衛積極不干預，但相信在現時的環境下沒有甚麼人會贊成，對嗎？爲甚麼？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，我們今天在全世界遇到的問題，聚焦在香港，是很簡單的道理，上一次出現這個情況是甚麼時候呢？就是差不多在十四世紀的時候。那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發生，與廣東人很有關係的。廣東在人類歷史最出名是甚麼呢？廣東最出名是「發瘟」，全世界大多數嚴重的傳染病，都是在華南廣東一帶出現。當時其中一樣是 Bubonic Plague ，透過舊絲綢之路及海上絲綢之路傳至歐洲，歐洲的人口因而減少 30%-60%。這件事有甚麼重要性？十分重要。突然間，勞動力對資本的比例急劇變化，Capital to Labour Ratio（勞動力對資本的比例）大增，K to L 的比例大升，資本充裕，勞動力短缺，因此創造了創新的機遇。這種創新機遇首先在農業開始，跟著步入商業，再步入工業，這其實是工業革命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。

1980 年中國改革開放。跟著在 1989 年，柏林圍牆倒下。80 年亦是全球經濟開放，全球解放了大量勞動力進入國際市場。我們剛剛遇到甚麼問題呢？30 年前，我們遇到全球的 Capital to Labour Ratio（資本對勞動力的比例）急劇下跌，與工業革命之前的情況剛剛相反，而香港正正在這個歷史巨變的最前哨，有甚麼理由我們不痛苦呢？一定痛苦。但痛苦之中，若變得快，則全部是機遇，不過我們變慢了，遲了 15 年，其實一早就應該變。97 年前變得快。你看那些廠家，人人拿著一個皮包就去中國，那時中國的金融業仍未開放，廠家借不到錢，到那裏借？在香港的銀行借，但憑什麼可以借呢？哪家銀行會借錢給香港的製造業到國內做生意？無人會就這樣借給你。

用甚麼做抵押？用房屋做抵押。還好香港房地產急升，可以抵押多借些錢，廠家才可以在珠三角擴大生產發展。這是靠香港的地產金融融資了不少在珠三角加工生產。

由於全球勞動力對資本的比例上升，勞動力很賤，資本才值錢。在這個過程，香港要如何面對呢？早面對會好些，遲了面對會更加急劇。第一，人力的資本要大力投資；第二，無資本的人，要幫他擁有資本。我一向贊成政府送房屋，反正香港地多，香港真的很多地，不過總是因爲種種原因、阻力和限制無法釋放出來。香港四成的地是郊野公園，每人分一塊好嗎？當然，日後環境會差了，再沒有地方行山。我們有大量的農地，爲甚麼不讓他們全變爲商住用地呢？你要面對這些抉擇，面對資本與勞動力急劇變化的時候，我們經已遲了十幾年，所以我們的年青人也好，老人也好，根本上不到車。這情況梁特首在過去一年已不斷告訴我們。香港現時的問題如何解決呢？人們沒有資本，但在這個世界，現時最重要的已變了，現在是資本。無資本，自然很憤怒，無法解決，唯一是給他們資本。慶幸香港有很矜貴的土地，我們在英國人統治下，叫做 Crown Land，現在叫人民的土地。你不能夠好好運用香港人民的土地，這唯一的財富，就無藥可救。

當然，要運用這財富必須取得共識，大家是否願意放棄以後行山的享受？我認爲最好的方法，是將郊野公園成立一個 trust， 全部送給環保團體。如果他們發展，他們每一個團體都賺錢，將土地全給他們，你猜環保團體會否肯將地賣出？你會否將地賣出？每一個都可能會變成 billionaire，你肯不肯呢？要作出決定，但這並不是你的決定、我的決定，這個是香港人要作出的決定，要建立一個機制，去作出這個共識的決定。無論將公屋送給他，或者將土地改變用途，這個並不是規劃者可以決定，這是個政治決策。公務員做不到，公務員是好有效率的隊伍，但並不是能夠作政治決策的隊伍。

這是我建議的藥，病人的問題，我們要用行動去解決，現在去請大夫。

多謝大家。